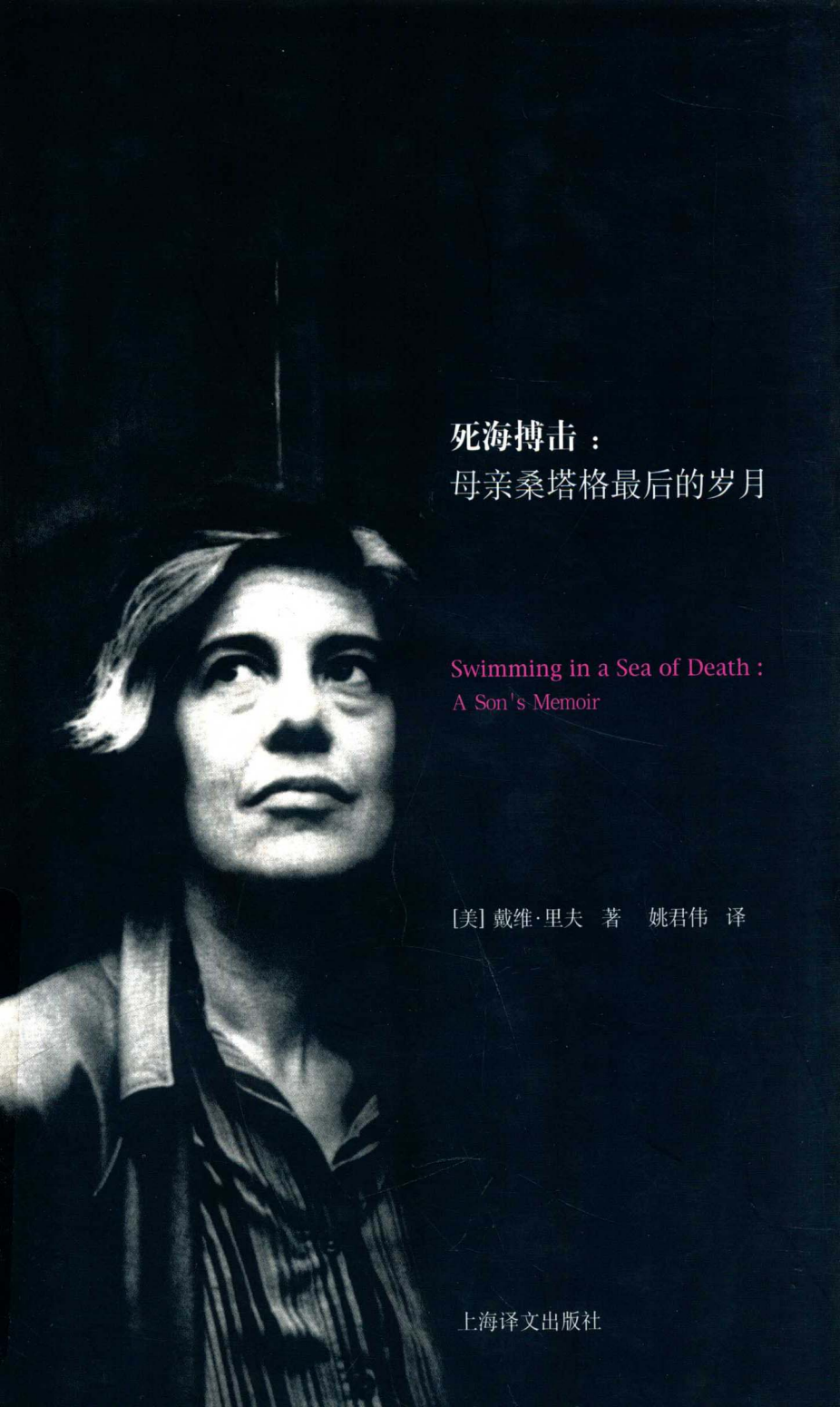




死海搏击：
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

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
A Son's Memoir

[美] 戴维·里夫 著 姚君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死海搏击：

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

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
A Son's Memoir

[美] 戴维·里夫 著 姚君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美)里夫
(Rieff, D.)著;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ISBN 978-7-5327-5215-7

I. ①死… II. ①里…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491 号

David Rieff

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Copyright © 2008, David Rieff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8-720号

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

[美]戴维·里夫 著 姚君伟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4 插页 5 字数 67,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10,000 册

ISBN 978-7-5327-5215-7 / I · 2981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6162648

献给米兰达

因为我知道时间永远是时间
地点始终是地点并且仅仅是地点
什么真实的只真实于一次时间
只真实于某一个地点
我对事物的现状感到欢欣
我拒不接受那张受了祝福的脸^①

T. S. 艾略特

《灰星期三》(一九三〇)

① 裴小龙译。

最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原以为自己是在结束一次漫长的国外旅程后,正要飞回我在纽约的家。没曾想,我却是在开始一次将以我母亲的去世而告终的行程。

具体说来,当时是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是个星期天,我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结束了中东之行后准备回国。在东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之间来来回回近一个月后(我一直在写有关阿拉法特最后统治时期巴勒斯坦人的报道),马上回家让我感到轻松,现在,人已在半路上了。除了这一点,事实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中东之行让我沮丧不已,我仅仅获得了我需要的部分材料。我心里有数,写好那篇报道殊为不易。但是,我累了,既有点筋疲力尽,心里又不好受,我尚未准备好把报道材料落实到文字。我可

以等到了家再说，所以，在美联航候机大厅，我开始打电话——往家里打电话，这是我每次一做完报道后的习惯。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母亲苏珊·桑塔格告诉我说，她可能又病了。

听得出来，我母亲在竭力说得轻松点。我跟她说了一大通约旦河西岸的现状，她最后对我说：“有可能搞错了。”她说，我不在的时候，她去做了一年两次的各种扫描和验血检查——这是自从六年前，她被诊断出子宫肌瘤并接受手术和化疗以来，她一直做的常规体检。“他们刚为我做的验血有一项结果好像不太好，”她说；接着，又说她又做了几次进一步的检查，问我第二天能否陪她去看一个专家，是别人推荐的，而且几天前已经为她增加了几项检查。第二天他就会给出诊断结论。“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她说，并提醒我，她查出子宫肌瘤后，还有，一九七五年她查出晚期乳腺癌之后切除了整个乳房，那两次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虚惊，结果根本就没事。

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我也空洞地重复着这句话。我们跟对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看法一致。至少，从理论上讲，我们俩这样认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那些惊吓最后不都是有惊无险吗？有一次，扫描发现她左肾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好像又是癌症，结果却只是我母亲的肾形状长得奇怪。后来还有一次，我母亲突然胃痉挛得十分厉害，医生担心她也许是患了结肠癌。这些恐慌最后也都是虚惊一场。我母亲四十岁出头第一次得了癌症，此后，像所有癌症病人一样，复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一直悬挂在她的头顶上，她已经学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时保持镇定，或者，

至少表现出镇定，尽管这很困难。这次也会是一场虚惊的，我们俩又强调了一遍。以前我们不也经历过吗？但是，我们的话就像微弱的呼吸，我们的平静是建立在麻木而非镇定的基础上的。我现在羞愧地承认，当时挂了电话，我感到如释重负。

接下来，我尽力不去想任何事情，而只是两眼盯着希思罗机场跑道，看飞机起落，直至听到自己航班的登机广播。上了飞机，我就喝醉了，但我总是这样的。飞机着陆后，我回家。到了家，往母亲公寓打电话，但接电话的是她的一个朋友，她说我母亲睡着了。我说我也准备睡了。我真的去睡了。如果说不去睡觉还有其他事情可做，那就是痛苦地尖叫，因为相信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我现在甚至都无法想象，当时她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第二天早上，我去母亲公寓接她。我立即发现，她不是没休息好，她是根本就没睡着。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她当时的亢奋，也记得我当时只是勉强装着应和她。我说“勉强”，因为尽管我保持了镇定，但是，在我说什么与我听见自己在说什么之间，似乎已经有那种最细微的停顿了。回想起来，我现在多么希望当时能紧紧拥抱她，或者握住她的手。但是，我们俩之间在肢体语言上从来都没有多少表达，人会急中生智弥补平时的一些不足，关于这一点，很多人说过或写文章谈过，但是，至少从我的经历看，真正发生的情形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展示出来的比我们的实际情形还要差。我和我母亲颠来倒去说的就是那些话，然而，那些话给人的感觉是几乎没有价值——就像美国内战期间南部联邦的美元或前苏联的卢布现在一文不值一样。我现在不太记得当时我自己的害怕

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想象着她心里的害怕。她滔滔不绝地谈论中东，而我呢，因为说不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更别提触摸她了，就一直讲有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在拉马拉的官邸——仿佛那还有多重重要似的。我们就这么聊着，一直聊到那个专家——确切地讲，是白血病专家——的诊所。

A 医生——以我对他的感觉，我宁可不提他的名字——是个大块头，他动作幅度很大（对我而言是盛气凌人），与他的虎背熊腰正好匹配。或许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也许，如果他有好一点的消息要告诉我们，甚或是告诉我们坏消息时态度好一点，那么，对他我心中保留的可能会是另一种形象——修士塔克^①，或是狄更斯笔下某个乐天派。对他说句公道话，我当时恐惧得紧张兮兮的，越来越找不着北。我觉得，一切都变了，我再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脆弱的。我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和 A 医生握握手，听到他就旅行采访记者说的某些话时机械地笑笑，然后坐在我母亲边上。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宣布坏消息的时候，我在他那张宽大而凌乱的桌子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因为，不是“什么事都没有”，而是事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A 医生很清楚。根据他上周五做的检查——验血和骨髓活检，他绝对肯定，我母亲得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②。

我和母亲一脸茫然地盯着他。我们俩谁也不明白 MDS 是什

① 罗宾汉传说中快活爽朗的胖修士。

② 简称 MDS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见下文。此症目前认为是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异常所致的造血功能障碍。

么意思。我们的脑子是一片糊涂，他是一脸的不悦。他解释说，MDS 是一种特别致命的血癌，他说得慢条斯理，就好像他面对的是一家子乡巴佬弱智。

“倒是说点什么啊，”我心里想。我的头在抽痛。我学着 A 医生的口吻，问他是否绝对肯定。不是有许多癌症也有类似的症状吗？我问道，希望在医学术语中寻找庇护，就像他似乎采用首字母缩合词和教学行话卖弄一样。有没有疑点，是否可能只是哪里出了点问题，而这点问题到头来只是不那么致命的问题？A 医生使劲地摇摇头。他说，验血，尤其是骨髓活检是毫无模棱两可之处的。接着，他就 MDS 作了解释。我听着，但没有真正听进去，我迷迷糊糊地听着这些陌生的词语和术语一连串地从他嘴里蹦出来，说得很顺溜，却没怎么听进去。他说，MDS 的标志性特征是“顽固性贫血”。我母亲的骨髓所造的干细胞无法再发育成成熟的血细胞，相反，它们一直是“胚细胞”——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不成熟的血细胞。

这些我当时都没有听进去，除了一点，即消息是可怕的。我不得不认为，以 A 医生的经验，他明白他这番解释不可能听一遍就明白。像很多医生一样，他跟我们讲话好像我们是小孩，却又根本不考虑一个明智的成年人在和一个孩子说话时该选择什么样的字眼；相反，他滔滔不绝，只管讲他的，像是在演讲大厅发表演讲。我和我母亲谁也没有打断他。

当然，他讲完后，我母亲询问 MDS 目前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有没有缓解病情的可能。他又一次不顾她有没有准备去接受他马

上要说的话，讲话的方式也根本无意去对我母亲或处于她的情况下可能会感到的恐惧表示任何特别的同情。假如医生全都这样，我也就原谅他了。可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这样，谢天谢地，我母亲后来发现了这一点。

A 医生对其话题很感兴趣。他回答说，实际上，对这些问题能给出的答案是，还没有什么治疗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至少还没有什么治疗能够给病情带来长期的缓解，更不用说治愈了。当然，有许多缓解药，用于改善病人“生活质量”的药物。这种表达——可称之为医学上的陈词滥调、委婉语，或者说得比较艺术的医学术语——是在我母亲患病期间医护人员会一次次重复的。A 医生接着说，倒是有一种叫 5-阿扎胞苷^①的药每每能产生一种暂时的缓解效果。但这一效果通常至多持续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除了 5-阿扎胞苷，治好 MDS 惟一一条路当然是骨髓移植。但 A 医生讲，对我母亲这样一个七十一岁的妇女来讲，那并非一条充满希望的途径。事实上，A 医生的意见是，我母亲什么也别做，一直等到 MDS“转成”——这个词的这一用法我是完全陌生的，但慢慢地，我会明白，并且惧怕——“完全成熟的”AML，即急性髓系白血病^②。

怎么会是这样，我一下子没有搞清楚。相反，等待似乎就是自杀，因为 AML 看来甚至比 MDS 还要糟糕得多（这些个首字母组合

① 一种抗代谢药物。

② 成人中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

词是多么迅速地开始植入人们的意识中啊)。得了 AML, 干细胞就发育成异常白、红血细胞和血小板。这些所谓的白血病细胞或胚细胞越多, 健康的血细胞和血小板的空间就越小。这意味着血液和骨髓中白血病细胞的数量一旦达到一个临界值, 身体就再也无法维持正常功能了。A 医生没有明说那不言而喻的结果, 接下来, 人就死去。他没必要说。我和我母亲已经明白。

从我母亲的公寓开车到 A 医生的诊所, 一路上我给她讲中东的事情时, 她脸上就挂着僵硬的笑容; 现在, 还是这样。但 A 医生在那里一个劲地讲的时候, 我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幻觉, 仿佛真的听见这一微笑在像蛋壳一样破裂。但我又意识到, 我的目光从她身上、从 A 医生身上移开了, 而去注视着他最近庆祝五十岁生日时收到的生日贺卡, 注视着他的书和几张他与家人的照片——事实上, 我就是没有看我母亲。所以, 我现在不能肯定。但我确实知道, 过了一会儿, 她才开始说话。

“这么说, 你是在告诉我,” 她最后以一种令人感到心酸的小心翼翼的口吻(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倒吸一口气)说, “事实上是没治了。”停顿片刻, 她又说: “我没什么可做了。”

A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 他的沉默,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 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几分钟后, 我们告辞。走之前, A 医生说, 有句话是必不可少的, 等我母亲想好了接下来她要做的事情之后, 请她再来找他——我现在还记得“要”这个词听上去感觉特别的怪异。我们朝车子走过去的时候, 一路沉默, 其难受程度超过了我能想象或体验的任何东西。在开往市中心的路上, 她一直盯着窗外

看。大约过了五分钟时间，她转过脸来，看着我。

“唉，”她说，“唉。”

如果说你生活中糟糕透顶的事情总是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这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可能是真的。但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时，你几乎总有这种感觉。或许，这样倒也好。毕竟，不去期待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是一种选择，其他选择会是无法忍受的。艾利亚斯·卡内蒂^①写过剧本，假定所有的人做事情时脖子上都挂着一个饰盒，上面标明他们的卒年。该剧的假设即其主旨所在：知道自己的死期会把生之体验变成等死一般。

我想，我之所以想起卡内蒂，不仅是因为我母亲喜爱他的作品，甚至还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他（我发觉该文既是一个作家在描述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是一篇伪装起来的自传^②），更是因为她所最珍爱的，这珍爱甚至超过那篇描写卡内蒂这个人的作品，我认为在于他对死亡的恐惧。更准确地讲，她和他一样，无论是年轻时还是年老时，都根本无法接受人总有一死这一现实。“我诅咒死亡，”他写道，“我禁不住要诅咒死亡。”你不妨说，他的观点就和她一样，与《创世记》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她早年的一则日记里——我母亲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一名十六岁的大学生——她写道，“甚至都无法想象哪天自己就不再活着”。像卡内蒂一样，她

① 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生于保加利亚，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该文即《作为激情的思想》，收入《在土星的标志下》。

把这种在年轻人身上正常得毫无新意的情感几乎一直带到她死于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那一刻——离她七十二岁生日只差不多三周的时间。

我试图传达的是她以她生的方式死去：不甘心接受人总要死的现实，即使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哦，天哪，她忍受的是怎样的痛苦啊！尽管受了这么多罪，我母亲依然和卡内蒂站在一边，和菲利普·拉金^①站在一边。拉金在其伟大的诗篇《晨曲》里写到他怕死、他蔑视宗教安慰和其他精神把戏：

……伪善的家伙们说：“理性的存在不会为一件

感受不到的事物而害怕，”却无视了

这正是我们所畏惧的——无形，无声，

无味，无臭，无法触及，无法去爱和关涉，

思虑中的无物，

无人能从中还魂的麻醉剂。^②

读着这些我年轻时就耳熟能详的诗行——尽管现在对我来说，它们让我想起的不再是拉金的秃头和他噘起的双唇，而是我母亲那一绺黑白相间、蓬乱的头发，以及她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我多想劝她接受现实。“别那么热爱生活，”我想说，“你总是过高

①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英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倡导者，战后英国涌现出的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② 姜涛译。

地估价生活。”我也想安慰她，尽管我一向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她不比拉金或者我自己更容易安慰。但是，我想试试，我在（非理性地）想象着让她稍稍接受死亡，如果那样不成的话，也许至少赋予她一丁点儿佛教徒对死亡的漠然。我想提醒她一件事：七十年代后期的一天，有个患了乳腺癌的妇女来看她，对她说她对西医不感兴趣，因为它只能使病情缓解，而她感兴趣的却是治愈。“但我们全都处于缓解之中，”我母亲对她说。我想提醒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愿意为人都是要死的这一情况进行“辩护”。

但是，如果我此刻跟自己讲实话，那么，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即使那样做了也是徒劳；我是说那样做不可能使她更强，或者更有准备，也安慰不了她。十八世纪，法国有个作家写信给一个朋友，问他：“像我这样憎恨生活，为什么还这么怕死呢？”这也是拉金的观点。卡内蒂曾经写道：“人们不应当将对生命的渴望混淆于对生命的认同。”这时候的他甚至也是持同一观点。然而，这不是我母亲的观点。她热爱生命，不妨说，她对体验的胃口和她对自己作为一名作家将会取得的成就所怀有的希望随着她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个词来描述她的生存之道，那就是“热切”。没有任何东西她不想看、不想做、不想去搞明白。

她的生活过得好像是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往一座图书馆里藏书，也可以说是在让她的种种渴望变成现实——从孤独的少女时代起，她的许多愿望始终都未改变。她从未提过，但是，我现在想知道她的自我感是否与这一“收藏”纠结在一起，解不开，理还乱——她那么多佳作写的就是这一题材。她在另一则日记里写

道，她永远都是个学生，她在思考一个问题：到最终，这是否是她最成功的角色。她想吸收；她不想被吸收——当然也不想被吸收进来世，吸收进虚空。她为什么，哦，不，她怎么可能想要关掉图书馆，让其中的藏品随风而逝，而绝无重整旗鼓的可能呢？“我在，死亡走，”伊壁鸠鲁写道，“死亡在，我走。”可正如我母亲所写的，她惟有想象生存。

我本以为能够安慰她的，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想当然的。她这么一个百无禁忌的人却难得能真正直接地谈论死亡，尽管我相信她一直在对死亡进行思考。我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生了病，刚刚有点懂人总有一死的含意——奇怪的是，是一尊乔治·华盛顿的雕像让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的：伟人也同样要死——我试图和她谈论死亡。我极其不安，快要绝望了，如果说还没哭出来，也快了，她尽力安慰我。但即使是当时，我记得我透过自己的悲伤，发觉她自己很快也变得极为不安。没过多久，我依稀觉得应该是我去安慰她，而非从她那里寻求安慰。“也许有某种奇怪的、化学的长生不老，”她告诉我，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声音越来越低，“不过，恐怕我们俩谁也等不到那一天了。”

当然，那时候，我还太小，帮不了她什么。但是，与 A 医生见过那一面后，以及在接下来她生病一直到去世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多么希望我多少能够安慰她一点儿。但是，几乎一直到她去世那一刻，我们谈的都是她的幸存，她与癌症作斗争，从来不谈她快不行了。我不准备提她要死了这个话题，除非她提。这是她的死，不是我的。她没有提。假设提，那即意味着承认她会死去，而她要